

# 战前李烈钧对冯玉祥政治态度转变的影响

王英维

(集宁师范学院 政史系, 内蒙古 乌兰察布 012000)

**摘要:**“九一八”之后,李烈钧曾建议冯玉祥在北方起事倒蒋。1933年长城抗战爆发,李被邀入京,了解到蒋介石有抗战的决心,以及亲睹长城抗战中中方的失败,认识到抗日的艰难。遂对蒋介石及其政府有所理解。从此李烈钧成为调节蒋冯关系的主要中间人。察哈尔抗日期间,李烈钧的主张大体而言是促冯南下与蒋合作,从而避免了内战的发生。察哈尔抗战之后,李烈钧几次受蒋介石所托,北上劝说冯玉祥晋京与蒋介石合作抗日,最终在其影响下冯玉祥方能不计前嫌参加国民党五大,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协和各方,以促蒋抗战。

**关键词:**李烈钧;冯玉祥;蒋介石;察哈尔抗战;福建事变;促蒋抗战

**中图分类号:** K8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22(2015)03-0079-05

**DOI:** 10.13307/j.issn.1008-6722.2015.03.13

## 引言

李烈钧和冯玉祥两人可谓感情弥笃,交情至厚。据冯玉祥的重要幕僚高兴亚观察称“冯认为李烈钧是朋友中最真心爱护他的人。”<sup>[1]169</sup>李烈钧的好友杨庚笙也认为李烈钧“晚尤与焕章先生极相得”<sup>[2]154</sup>。第三者认为两人交好,当事人自己亦承认两者关系亲密。冯玉祥在1936年10月17日日记中称“李协和先生急公好义,淡泊明志,无一事不在大处想,无一事不在大处看,对朋友,对国家,无一不秉公至公至诚说话,诚为最为难得之良友。”<sup>[3]814</sup>李烈钧在其回忆中也称两人关系是“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慨”。<sup>[2]97</sup>

两人友谊绵存,至死不渝,在重大事情上的态度难免会相互影响。对此,冯玉祥的幕僚孙冠贤称“回忆过去在张家口时,李烈钧一去,冯就叫他住在图书馆他自己住的那座房子里,而那里从来是不给别人住的。在泰山时,李一去,冯就叫他住在风景最幽雅的王母池,并派一连卫队保护他。李的长公子赣朋因作风问题父子不和;赣朋跑到泰山,经冯教育,恢复了父子关系。蒋介石请冯到南京去,冯不去;李到泰山斡旋,冯还是去了。冯在南京陵园住,经常和李同车出入,一路上无话不谈。”“在庐山时,冯每事都找李商量,甚至上山下山也要征求李的意见。”<sup>[4]</sup>可见,李烈钧对冯玉祥的影响至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人侵来势汹汹,不可遏制,而此时的冯玉祥对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抗日一度失望,故主张抗日,亦必须倒蒋,遂有察哈尔抗日行动。1934年前后发生了福建事变,冯玉祥参加该次反蒋行动亦甚积极。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危机时,冯玉祥却南下与蒋介石合作抗日,可谓态度转变明显。至于其态度转变的原因,学术界现有的研究多未能揭示这一点。据本人考察,冯玉祥除了有自身的主观动力外,客观上还受到李烈钧的影响。

**收稿日期:** 2015-03-11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NJSY281)

**作者简介:** 王英维(1977-),男,辽宁绥中人,集宁师范学院政史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思想史、民族边疆史。

## 一、力劝冯玉祥抗日不要反蒋

察哈尔抗战期间冯玉祥在反蒋抗日的背景下展开活动,后来抗战陷入危局,经过李烈钧的斡旋,双方剑拔弩张之势得到了解决。“李烈钧于8月11日在庐山多次与蒋介石晤谈,蒋保证‘察事和平解决’。”<sup>①</sup>劝说冯玉祥下野之事,“冯玉祥当时犹豫不决”<sup>[5]464</sup>。后来,冯玉祥在同盟军处在困境时宣布下野,内战得以避免。李烈钧抱病奔走在蒋冯之间,正如其1933年8月7日致蒋介石电中所云,“所以屡为言者,以前途辽远,欲公等略复夙好耳”<sup>[6]771</sup>。换言之,无非为顾全大局,促蒋冯和好,实现共同抗日以救民族危亡。

冯玉祥无奈下野,在1933年8月10日日记中写道“余今此去,一方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做抗日讨贼之计。”<sup>[3]153</sup>换言之,冯玉祥此后还在秘密筹划倒蒋。虽然冯玉祥并未放弃反蒋,但也有所反思。他在1933年10月17日日记中写道“抗日,力不足;讨贼,力亦不足。如为抗日,一拼死命则可。即讨贼,何尝不可,惟送了人家许多性命,自己一走了事,除将一点力量毁掉外,于事有何益也?所谓不识大体者其在此乎?”<sup>[3]206</sup>也就是说,冯玉祥虽然对蒋介石失望已极,但对于倒蒋却感到力不从心。

1933年底福建酝酿反蒋运动,另组织新政府。对此冯在1933年11月22日日记中称“可贺可喜之事已成立,我惟有祝其成功,以救此危险之国家,以救此贫苦无告之人民。”<sup>[3]231</sup>并且“派软墨林、余心清代表他前往工作”<sup>[7]24</sup>。当时,他在1933年12月31日日记中自我表白“一刻都不忘如何发动各方,推倒独裁卖国政府。但是,办起来时却觉得很不容易也。”<sup>[3]252</sup>换言之,冯玉祥从自己的反蒋历史上总结出一个道理,反对蒋介石的各方实力派的军事行动不易同时发动,成功渺茫。尤其是发动自己的旧部反蒋不能如意,如韩复榘和宋哲元都不肯配合行动。高兴亚回忆称“冯玉祥经过事变,对于旧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再认为是那么可靠的了。”<sup>[1]169</sup>故冯玉祥对福建反蒋可谓抱以最后的希望,他在1933年12月15日日记中称“福建之事如不成,此后卖国贼之势力更无法消灭了。”<sup>[3]245</sup>

福建反蒋失败后,1934年5月,蒋介石曾请李烈钧到泰山和冯玉祥商谈蒋冯合作抗日问题。宋聿修回忆称,李烈钧走后冯玉祥召集幕僚们开会,冯说“协和先生来是劝我到南京去,他说蒋先生已决心抗战,正在加紧备战。如果主张抗日的同志们都到南京,可以促使蒋先生早日发动抗日。我对蒋先生是否决心抗日尚有疑问,所以没有对协和先生明确回答。”<sup>②</sup>冯玉祥的另一重要幕府高兴亚也回忆“李烈钧带着眷属,先后至少住了八个月”“对冯甚表亲密,劝冯事事忍耐,并谓蒋固可恶,何应钦则更坏。他的话很投合冯的心意”<sup>[1]168</sup>。换言之,李烈钧认为蒋介石已经有了抗战准备,然而蒋介石身边的人却簇满了投降分子,如何应钦等人。为进一步影响蒋介石下抗战决心,方劝冯玉祥南下与蒋合作,促蒋抗战。

当冯玉祥游览胶东到烟台时李烈钧又由南京赶来,据宋聿修回忆,仍劝冯赴南京,“并说蒋已一再表示抗日”。<sup>③</sup>在此,“李烈钧批评冯玉祥有两次失掉机会:一是由峪道河到南京的时间太早;一是组织抗日同盟军的前夕拒绝赴保定与蒋介石见面。其意是认为这样做表现出与蒋决裂太甚,以致难以转圜”<sup>[1]169</sup>。换言之,李烈钧对于冯玉祥激烈的反蒋行为表示不认同。其意乃在调解蒋冯关系,冀望携手抗战,以救民族危亡。关于这次密谈,在1934年6月7日李烈钧赴青岛时对外界称“以国危至此,欲与煥章先生研究中国之弊害,与海内正人君子共拯之。”<sup>[6]787</sup>

## 二、敦促冯玉祥促蒋抗战

到1934年冬,有一次李烈钧住在铁路宾馆,曾与冯密谈数次。“冯玉祥在与李烈钧谈过之后,就召集当时在山上的李兴中、余心清、张锋伯、董志诚、赖亚力、吴组缜、何章海、宋秀德等,商议可否往南京与蒋合

① 参见张竟渊编《李烈钧年谱》,《武宁文史资料》第6辑,1997年,第81页。

② 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宋聿修回忆录》,《开封文史资料》第13辑,1993年,第102页。

③ 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宋聿修回忆录》,《开封文史资料》第13辑,1993年,第107页。

作问题。会上,出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蒋介石绝无抗日诚意,而且他不讲信义,如果贸然赴京,不仅达不到抗日的目的,且有很大的危险。一种意见认为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抗日的情况下,如果不表明态度,将无法维持其统治。而且蒋介石主要依靠美国。在美日矛盾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也有抗日的可能。蒋介石在当时也不敢加害冯将军。冯到南京后,可以起到促蒋抗日的的作用,对抗日救国大局是有利的。”<sup>[5]468</sup>这次,冯未被所动。冯玉祥虽未去南京,但他于1934年12月26日在日记中写道“真抗日,仇敌可作朋友;不抗日,同志作为仇敌。”<sup>[3]460</sup>换言之,只要蒋介石能表明其抗日态度,付诸抗日行动,则冯玉祥是可以与蒋介石合作的,达到共同抗日救国的目的。

1935年3月,蒋介石又派李烈钧往烟台与冯商谈抗日合作问题。1935年3月16日,冯日记中记有同李谈话,如“国事不了的情形”<sup>[3]504</sup>。由于往来亲密,为国难而奔走呼号,冯玉祥对李烈钧非常敬佩,还特关心李烈钧之饮食起居。如1935年3月19日其日记中称“协和到铁路宾馆去住,因睡床板周身疼也”<sup>[3]506</sup>。宋聿修称李烈钧此来,“据他说蒋介石已经下了抗战的决心,他可以担保决不会变更,并说程潜已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和冯将军同到南京,担任重要军职。李烈钧敦促冯立即作出决定,他好回南京告知蒋介石。”<sup>[5]468</sup>为此,冯又召集随从人员进行商谈。“当时董志诚认为蒋介石既已表示抗战,又由李烈钧保证,为了促成抗战早日实现,冯玉祥应答应到南京去。”<sup>[5]468</sup>“冯根据多数人的意见,基本上同意到南京去,李烈钧得到肯定答复后,立即返回南京。”<sup>[5]468</sup>经李烈钧在冯与蒋之间的“一再疏通,双方基本上取得了谅解”<sup>①</sup>。

冯玉祥反蒋历时数年,以往的宿怨当然不会登时烟消云散。1935年6月11日,其仍在日记中称“日本要什么,南京即应允什么。非南京应允,乃蒋应允也。对外不抵抗,对内部妥协,即对日本为孝子,为贤孙,而对内、对同胞则赶尽杀绝是也。”<sup>[3]554</sup>换言之,冯玉祥对于蒋介石的抗日态度及其诚意还表示怀疑。在此期间一度拟赴新疆。还与反蒋的刘湘相往来,要刘湘“必须主张抗日,蒋不抗日为全国人民所唾弃,刘只要坚决拥护抗日并作实际准备就有可能联络一切的反蒋力量”<sup>[1]170</sup>。换言之,蒋介石若不抗日,冯玉祥就仍然继续反蒋。在该年6月,冯玉祥还向何章海和宋聿修二人表示“南京的一些朋友,都请我到南京去,我现在还未拿定主意。我想让你二位先到南京去,看看南京政府有没有抗战的准备。”<sup>②</sup>

1935年7月,日本进一步侵华,华北事变的爆发,平津危急万状。李烈钧不仅自己支持蒋介石抗日,而且还影响他的好友冯玉祥支持蒋介石。如冯玉祥于该年7月20日的日记载有“协和先生有信来,说有新的奇伟办法。”<sup>[3]577</sup>该奇伟办法冯玉祥在1935年7月31日日记中称这是“为人家做皇帝也”<sup>[3]582</sup>。实质上,就是李烈钧要求冯玉祥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战,这样“从南京政府内部团结抗日力量,同时可以作主张抗日的在野派以及各杂牌力量的代言人,使南京政府不敢完全陷入不抵抗的投降政策”<sup>[1]170</sup>。

到1935年9月,李烈钧在南京电促冯玉祥到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冯对此没有应允,据其参谋冯纪法称“冯先生不去南京确实有顾虑的,他怕中了蒋的圈套遭到暗算。”<sup>[8]75</sup>10月27日,李烈钧致电冯玉祥“亡国惨痛,即在目前,天下宁有负苍生之望者,犹有游于山水间耶?”<sup>[8]76</sup>“这已经有指责的意思了,坚定了冯先生去南京的信念。”<sup>[8]76</sup>就是在李烈钧的一再促使下,11月1日,“冯玉祥不顾幕僚们的反对离开泰山南下进京了”<sup>[7]25</sup>。对此,冯玉祥的秘书王倬如回忆称“冯和国民党政府中很多权要如张治中、程潜、邵力子、李烈钧、于右任、孙科、邹鲁等关系密切,他们对冯的政治主张给了不同程度的支持,特别是李烈钧与冯私谊较深。李是国民党中央常委,他极力在蒋冯之间穿针引线,想把冯拉到南京去。1935年11月1日冯到南京,李从中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sup>[9]</sup>

### 三、与冯玉祥协作拥蒋抗战

冯玉祥到南京后,李烈钧向冯玉祥进一步解释蒋介石的政治立场。据高兴亚回忆,“当时,李烈钧亦将蒋的过失大部归于何应钦。冯玉祥于是认为蒋态度谦下,有悔过的诚意”<sup>[1]171</sup>。近人周玉和经过研究也认

① 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宋聿修回忆录》,《开封文史资料》第13辑,1993年,第114页。

② 政协河南开封市委员会文史委编《宋聿修回忆录》,《开封文史资料》第13辑,1993年,第110页。

为,李烈钧影响了冯玉祥。他称“到南京后,李烈钧又说,蒋的过失不是他本人的问题,主要是他周围的人如何应钦等造成的。冯玉祥到南京的二十多天来,蒋与他几乎朝夕相处,事事向他请教,他每提出一个建议,蒋都诺诺应允。冯玉祥感到李烈钧的话有道理,蒋有悔过的诚意。”<sup>[10]121-122</sup>对此,冯玉祥深感欣慰,在1935年11月26日日记中称“介石所答之话为最谦下,为最和平,更为最诚恳,实为我最满意也,此次可谓之不白来也。”<sup>[3]654</sup>

冯玉祥自来南京后,数次以个人名义或与他人联名函电敦请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进京,共筹国是,为促国民党上层人物团结抗日。同时又一再向宋哲元、韩复榘等旧部说明蒋是要抗日的,希望他们服从中央,保持统一。“勉励宋哲元、韩复榘等勿为日寇所惑。”<sup>[1]173</sup>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冯玉祥的部将韩复榘和宋哲元倒蒋的决心并未动摇。“当时两广计划倒蒋,韩复榘邀宋哲元会晤于泊头车站,商定第一步立于中立,第二步参加讨蒋,即由何其鞏主稿,以马电致中央。”<sup>[11]</sup>正是由于冯玉祥态度的转变,韩、宋等人才未敢轻举妄动。对此,李烈钧对冯玉祥说“吾人可谓苦心孤诣,然吾人为国实应苦心孤诣也。”<sup>[3]727</sup>

战前反蒋的中心在两广,1936年两广的政治领袖胡汉民突然患病去世,这为蒋介石解决两广提供了契机。为扭转被动局面,广东陈济棠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合作共同反蒋抗日,遂有两广事变的爆发,双方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在此事变中,李烈钧与冯玉祥经常聚首相商解决之方,就连发电报的事情也是两人同时署名。如1936年6月9日,冯玉祥在其日记中称“发了三个电报,是我同协和先生的名字。”<sup>[3]736</sup>此后两人共同关注两广情况的变化,向各方发电也由“协公拟稿”。这时冯玉祥主张和平解决,“并派人北上,叮嘱韩复榘和宋哲元,以防他们行动越轨。”<sup>[10]135</sup>换言之,此时的冯玉祥是反对南北联合共同倒蒋的。同时,也力劝蒋介石以和平解决争端,以此避免内耗。如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称“事态发展至此,蒋先生也深知战争一发便不可收拾,遂渐有放弃武力解决,并收回成命的打算。适冯玉祥自南京上庐山,乃乘机向蒋先生进言,劝勿断丧国家元气,在冯氏缓颊之下,蒋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sup>[12]</sup>可见,冯玉祥的调解之功尤为重要。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又踵继发生,该事变的来龙去脉也是李烈钧告诉冯玉祥的,“协和主张安全介石为主”<sup>[3]848</sup>。作为在野派的代言人冯玉祥而言,当时他的立场可以影响旧部韩复榘和宋哲元等人,还可以影响其他地方实力派人物。在12月13日,冯玉祥首先发出释放蒋介石的号召,“派贴心幕僚到华北去,嘱咐韩复榘、宋哲元等旧部拥护中央,防止二人有越轨的言行。”<sup>[7]25-26</sup>冯玉祥从大局出发,团结了各地方实力派,保释了党魁蒋介石,最终促成了国共一致抗战。

战前冯玉祥与李烈钧共同协作,调解各方团结抗战,可谓贡献厥伟。正如冯玉祥所言,他与蒋介石“而今情好如初,一则因年岁大了,一则因多共患难,更大的事是日人之压迫,非真团结不能救国,而亦不能自救也。我冯玉祥应时时以精诚团结救国抗日八字为主,更要的是拥护中央,拥护介石也”<sup>[13]</sup>。这既有冯玉祥的爱国大义所支配,亦有好友李烈钧的影响。故冯玉祥对李烈钧团结抗战的努力亦称“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睹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敢议,犹恐言单,无补国是,复促友人为之。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忠直无私,竭尽心力矣。”<sup>[2]137</sup>

综上,察哈尔抗战之后,冯玉祥倒蒋之心不死。经过福建事变的失败,冯认识到倒蒋的力量薄弱,发动旧部及其他各方倒蒋不易成功。经过李烈钧三番五次奔走在冯玉祥和蒋介石之间,双方基本上取得了谅解。出于爱国赤诚,只要蒋介石表示抗日诚意,冯玉祥即可与之合作。故在李烈钧的劝说及保证下,在华北事变之后南下南京与蒋合作。战前冯玉祥放弃反蒋与之合作,作为冯玉祥的密友李烈钧在其中都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主要中间调节人的角色。可以说,这是李烈钧在抗日战争中的主要贡献。冯玉祥南下与蒋合作后,一方面冯、李两人从南京政府内部来团结抗日力量,另一方面让冯玉祥做一面旗帜,来影响反蒋的在野派及地方实力派从大局出发一致抗日,以挽救危亡。

## 参考文献:

- [1] 高兴亚. 冯玉祥将军 [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82.
- [2] 李烈钧. 李烈钧将军自传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 冯玉祥. 冯玉祥日记: 第4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 [4] 孙冠贤. 在冯玉祥将军身边 [C]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 军事派系(上).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492.
- [5] 宋聿修. 回忆冯玉祥将军 [C]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九、十、十一卷“军政人物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 [6] 李烈钧. 李烈钧集(下) [M]. 周元高, 孟彭兴, 苏颖云, 编.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7] 阎团结, 梁星亮. 冯玉祥幕府与幕僚 [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
- [8] 侯宏绪. 随从参谋冯纪法回忆在冯玉祥将军身边十五年 [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9.
- [9] 王倬如. 我对爱国将军冯玉祥的了解 [C] //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中华文史资料文库. 第九、十、十一卷“军政人物编”.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 476.
- [10] 周玉和. 从合作到决裂: 蒋介石与冯玉祥 [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9: 135.
- [11] 萧振瀛. 华北危局纪实 [M].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59.
- [12]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 [M]. 唐德刚, 整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493.
- [13] 冯玉祥. 冯玉祥日记: 第5卷 [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178.

## Li Lie – jun’ s Influence on Feng Yu – xiang’ s Political Attitude Change before the Anti – Japanese War

WANG Ying – wei

( Politic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Jining Normal University, Wulanchabu Inner Mongolia 012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of 1931, Li Lie – jun suggested Feng Yu – xiang oppose Chiang Kai – shek in the north. When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n the Great Wall broke out in 1933, Li was invited to Nanjing. He learned Chiang Kai – shek’s determination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itnessed Chinese failure in that war, and recognized the difficulties of Anti – Japanese War, so Li had an understanding of Chiang Kai – shek and his government. Since then, Li Lie – jun became the main trouble – shooter of Chiang and Feng’ s contradic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 – Japanese War in Chahar, Li Lie – jun’ s general proposal was to persuade Feng to go south and cooperate with Chiang, which avoided the occurrence of civil war. After the Anti – Japanese War in Chahar, Li Lie – jun was entrusted by Chiang Kai – shek and went to north several times to advise Feng to go to Nanjing and cooperate with Chiang Kai – shek. Eventuall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Li, Feng Yu – xiang put aside the divergences and attended the fifth delegate plenary session of Kuomintang. Feng harmonized every part inside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Chiang’ 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eywords:** Li Lie – jun; Feng Yu – xiang; Chiang Kai – shek; Anti – Japanese War in Chahar; Fujian Incident; the promotion of Chiang’ s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